自由与繁荣的国家—社会平衡
——《狭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评介

曾楚媛

内容提要：《狭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一书延续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中的基本思路，以英、美、中、印、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作为丰富案例，探讨国家与社会处于何种竞合关系中更易走向自由和经济繁荣的宏大问题，提出政治自由及随之产生的积极经济结果的实现，关键在于形成强社会和强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该书结合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制度经济学视角，搭建动态模型，其演绎推理和规律验证简洁生动，试图超越作者二人近年来提倡的“制度决定论”。然该书存在个别定义重复、关键变量表述模糊、对关联性考虑不周等不足。总体看来，瑕不掩瑜，本书观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键词：利维坦　国家与社会　自由　经济增长　制度决定论

文明国家中，无知和自由兼具者，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托马斯·杰斐逊，1816年[1]

过去一万年间，人类从部落开始，慢慢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一个又一个数百万、千万人合力运转的社会。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自由”[2]的概

曾楚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1 Thomas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to Charles Yancey, 6 January 1816,” National Archives: Founders Online, NHPRC, 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3-09-02-0209, 2020-10-20.

2 本文中所使用的“自由”一词均指“liberty”。

念就已存在；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经历各阶段演变，逐渐发展成熟。无论处于历史的哪一个阶段，关于自由的讨论往往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考究紧密相连，强大的国家能否以及如何与公民所追求的自由、繁荣相协调，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经久不衰的热议主题之一。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提出“历史的终结”的著名预言：历史将走向“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的结局。[1] 30年过去，世界似乎并未朝福山预言的方向前行，而是在右翼民粹主义盛行、国际恐怖主义肆虐等背景下愈发呈现碎片化的分裂趋势。时政分析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指出，其于1994年预言的“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到来”。[2]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则称技术发展将带来精英暴政。[3] 在全球走向充满变数之际，如何达致真正的自由与繁荣，成为值得深思的关键问题。

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看来，自由“在历史上和如今都非常罕见”，[4] 并非普遍存在。在《狭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以下简称《狭窄走廊》）一书中，作者二人搭建起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之间的动态关系，意图回答为何自由在某些国家得到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走向威权主义或无政府状态，并探讨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新威胁，自由却能继续找到繁荣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在2005年获得了授予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2012年，因开展具有持久意义的工作获得欧文·普莱因·内默斯（Erwin Plein Nemmers）经济学奖；2016年，又因卓越贡献获得了BBVA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阿西莫格鲁的长期合作伙伴、政治学家兼经济学家詹姆斯·罗宾逊是芝加哥大学的九位校级教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16, 1989, pp. 3-18.

2 1994年，卡普兰发表《即将到来的无政府主义》一文，准确预言了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非洲国家政府的垮台以及在土耳其等地政治伊斯兰的崛起。2018年11月，卡普兰在《国家利益》发表《已经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回顾其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并再次分析讨论其中涉及的问题，认为20年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他所说的“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参见 Robert D. Kaplan，“The Coming Anarchy，” *The Atlantic*，1994，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94/02/the-coming-anarchy/304670/，2020-09-18；Robert D. Kaplan，“The Anarchy That Came，” *The National Interest*，2018，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narchy-came-33872，2020-09-18。

3 Yuval Noah Harari, “Why Technology Favors Tyranny,” *The Atlantic*,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10/yuval-noah-hararitechnology-tyranny/568330/, 2020-09-18.

4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p. xi.

授（University Professors）之一，专注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研究。二人在职业生涯中往往关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相对宏观的问题，例如“独裁和民主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为什么有些国家繁荣昌盛，而另一些国家仍陷于贫困？”等。[1]

《狭窄走廊》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作的第三本书，该书毫不意外地延续了二人上一部作品《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政治制度决定国家成败”的基调。《国家为什么失败》出版于2012年，将“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和“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进行了对比。[2]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通过大量例子证明，语言和文化底蕴相同但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会取得不同的经济结果。攫取性制度下的国家往往既贫穷又压制；而包容性制度下的国家通过强大的财产权、民主问责制和法治，来激发创新，促进社会流动，往往既富裕又自由。学界对此书评价褒贬不一，先后有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前世界银行经济学专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等参与论战，[3] 可见政治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大热辩议题。在《狭窄走廊》一书中，二人在前作基本思路的基础上，打破过往理论框架，试图更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是如何实现或为何未能实现自由”这一命题[4]。

本文下面将介绍《狭窄走廊》一书的主要内容和贡献特点，并提出笔者研读之后的几点困惑，以供探讨。

1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N.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A, Amsterdam: Elsevier, 2005, pp. 385-472;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1, 2008, pp. 267-293;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2012.

2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3 Francis Fukuyama, “Acemoglu and Robinson on Why Nations Fail,” *The American Interest*, March 26, 201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330002122/http://blogs.the-american-interest.com/fukuyama/2012/03/26/acemoglu-and-robinson-on-why-nations-fail/, 2020-09-20;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Response to Fukuyama’s Review,” April 30, 2012, http://whynationsfail.com/blog/2012/4/30/response-to-fukuyamas-review.html, 2020-09-20; Jared Diamond, “What Makes Countries Rich or Poor?” *The New York Review*, June 7, 2012,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jun/07/what-makes-countries-rich-or-poor/, 2020-09-20; William Easterly, “The Root of Hardship,”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 March 24, 2012,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724404577293714016708378, 2020-09-20.

4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xi.

一、主要内容

（一）问题与论点

《狭窄走廊》的前言部分和第一章围绕自由的定义和实现自由的条件展开讨论，是全书分析的重要铺垫。在众多关于自由的定义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英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自由做出了最基本的解释——真正的自由“使人们免于暴力、恐吓和其他有损尊严的行为，让人们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能够免受不合理惩罚的威胁或严厉的社会制裁”。[1] 观察近十年来，叙利亚内战和动乱不止，数百万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组织肆虐、搅乱世界安宁，这些都是自由岌岌可危的体现。

英国内战时期，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中，推崇以《圣经》中威力无比的海怪“利维坦”（Leviathan）来比喻的国家作为绝对威权的概念。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却指出，国家实际上是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一面代表光明，解决冲突、实行法治、遏制暴力；一面是黑暗，限制人们获取自由的权力。以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The Epic of Gilgamesh*）为例，神灵提出以同样强大的恩奇都（Enkidu）来制衡无人敢反对、失去控制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但这一提议很快遭到挫败，因同为国家精英的二者一拍即合、成为伙伴，共同抵抗神灵的管制，“自由的前景随‘分权制衡’而消失无踪”。[2] 作者认为，“吉尔伽美什难题”给出的启示是，自由的获得无法简单仰仗国家或控制国家的精英来给予，而是需要国家与法律的结合，通过普通民众及其动员下的社会对国家进行约束，方能保护及提升自由。

国家和社会必须同样强大，自由和繁荣才得以出现。必须有强国家，方可控制暴力，执行法律，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必须有强（动员性）社会，方可控制和约束强国家。

借此，作者提出该书的主要论点：国家和社会必须同样强大，自由和繁荣才得以出现。必须有强国家，方可控制暴力，执行法律，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必须有强（动员性）社会，方可控制和约束强国家。[3]

（二）理论框架

在第二章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展示了该书的基本理论框架。他们认

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in Ian Shapiro ed.,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4, quoted from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xi.

2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15.

3 Ibid.

为，人类所追寻的自由及作为自由结果的经济繁荣，只存在于一条“狭窄走廊”（narrow corridor）之中。当国家和社会的能力（capacity）同时增强时，该文明就会进入这条“狭窄走廊”，且形成国家和社会既竞争又合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增强的良性循环。

受霍布斯国家起源学说的启发，阿西莫格鲁二人一改此前在多篇著述中采用“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来区分国家的二分法，提出了“缺席型利维坦”（Absent Leviathan）、“专制型利维坦”（Despotic Leviathan）和“受束缚的利维坦”（Shackled Leviathan）的三分法。[1] 它们分别对应无政府状态（anarchy，书中称为 Warre），专制主义国家，以及“有能力执行法律、控制暴力、解决冲突、提供公共服务，但仍被自信、组织良好的社会驯服和控制的国家”。[2]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他们提出的核心概念总结为一个简洁的模型（见图1），其中，横轴表示社会权力，纵轴表示国家权力，处于横纵两轴之间的是一条介于专制—强国家社会和无政府—弱国家社会之间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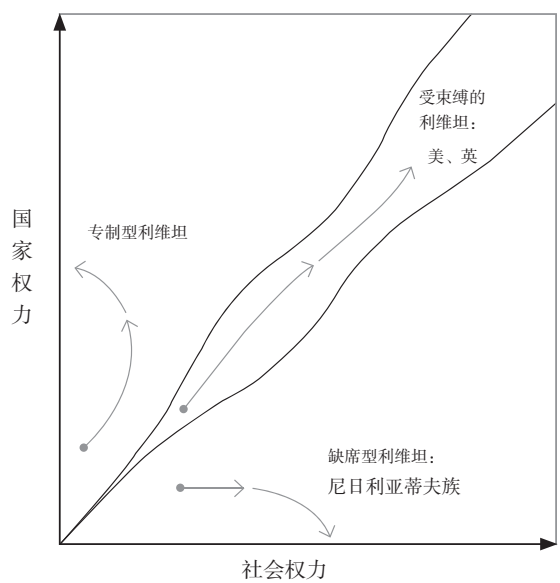

图1 “专制型利维坦”“受束缚的利维坦”和“缺席型利维坦”的进化过程[3]

资料来源：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15; p. 53。

1 在该书的案例检验部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还提出了“纸老虎利维坦”（Paper Leviathan）的概念。

2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15; p. 53.

3 Ibid., p. 64.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国家或部落的权力平衡及平衡发生变化后的情况，作者提出了“两方权力、一种平衡”的动态理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指出，自由只有在国家权力受束缚的国家才有可能出现——如果国家和社会都很虚弱，这是一种专制或无政府的状态；当国家相对于社会的权力过于弱小，即利维坦缺席，便无法保护个人免受各种威胁；当国家相对于社会的权力过于强大，即“专制型利维坦”，个人便无法保护自己免受专制胁迫——因此，只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二者互为约束，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成为“受束缚的利维坦”之时，真正的自由才会出现；自由平衡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竞争合作需求，反过来也被这种平衡所强化。依作者之见，“受束缚的利维坦”之所以能创造自由并走向繁荣是遵循了如下的逻辑：首先，在个人和团体的推动下，政治精英及精英设立的制度建设了足够强大的国家；同时，社会广泛、积极地参与政治，在必要时进行社会抗议，拥有让政府换届的投票权利，等等，对精英和国家产生制衡压力。国家和社会因此同时变得更为强大，人类便拥有继续进步、创造经济繁荣的条件和机会。[1]

（三）案例验证

根据这一理论模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进行了直观梳理，并引入一种新的利维坦类型——“纸老虎利维坦”（Paper Leviathan），以四类利维坦作为分类依据，用第三至第十二共计十章的篇幅，对数十个案例进行了检验论证。例如，以规范（cage of norms）代替国家制度来管理社会的尼日利亚蒂夫族（The Tiv）代表了“缺席型利维坦”；“受束缚的利维坦”的例子包括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公社、当代德国、美国、英国和北欧国家；“专制型利维坦”以纳粹德国和俄罗斯等为代表；“纸老虎利维坦”详见于南美、非洲的前西欧殖民地国家。

作者二人强调，自由是努力和斗争的结果。作为“受束缚的利维坦”的典型代表，英美两国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互相管制的平衡互动，因而踏入了自由繁荣的“狭窄走廊”。这种平衡互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欧洲大剪刀”（The European Scissors）的宝贵遗产：剪刀的一面刀刃是源自罗马时期自上而下的国家强力统治制度，另一面刀刃则源于日耳曼部落自下而上的合议制基因。[2] 英格兰承袭了这把“剪刀”，在成为英国政治制度基石的《大宪章》和“光荣革命”中可见一斑，通过贵族对国王限权，英国过渡到社会制衡国家的状态；美国则是联邦党人和邦联派斗争妥协的产物，强力政府通过征税来维护国家机器，实行保护公民和镇压

1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466; p. 673; pp. 143-145.

2 Ibid., p. 245.

暴力的职能，继而产生社会发展的条件，而社会则通过法案平衡政府的权力来达到自由。

南美洲的阿根廷属于“纸老虎利维坦”，该类国家呈现出与另外三种国家—社会关系不同的状态。阿根廷拥有法律、军队及官僚机构，专制在此未能寻到稳定土壤，但它也缺乏束缚国家的能力。此类国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十分常见，它们“均建立在弱势和无序的社会之上”，[1] 无法解决冲突、执行法律或提供公共服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一针见血地指出，“纸老虎利维坦”正是欧洲殖民的产物，多数出现在他们此前著述中多次强调的“攫取性制度”盛行的地区，殖民势力引入国家制度却不允许社会控制，“间接统治”之下缺失精英官僚和法治。独立后，后殖民国家的专断性以及赋予实力虚弱的部分独立国家国际合法性的国际体系，进一步打造了这群薄如蝉翼的“纸老虎”。

（四）总结与扩展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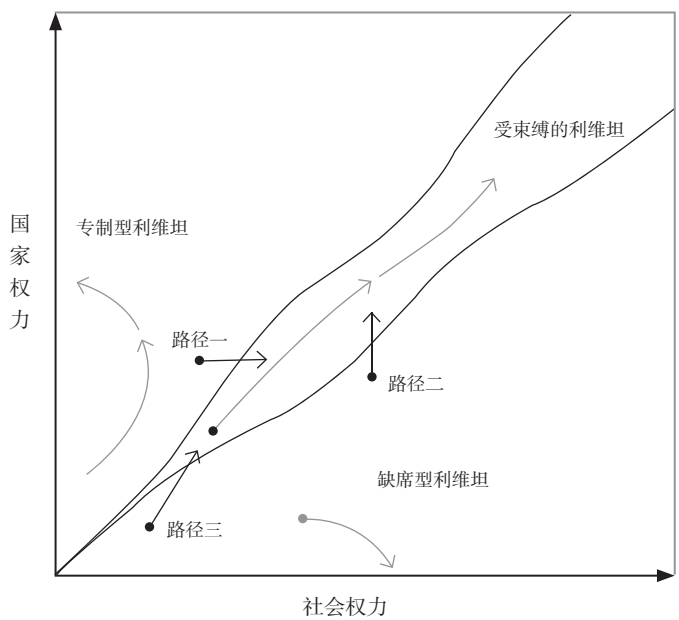

图2 进入“走廊”的门道

资料来源：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642。

1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507.

在《狭窄走廊》的最后部分，作者对国家达致自由繁荣的“狭窄走廊”的三大关键因素做了总结：一是形成支持这种过渡的政治联盟的能力，二是当前国家和社会权力平衡相对于“走廊”的位置，三是影响前两个因素作用的“走廊”的形状。支持过渡的政治联盟通过同时扩大社会动员和增强国家能力使国家进入“走廊”。例如南非的非国大党（ANC）、黑人中产阶级和白人实业家，通过黑人经济赋权计划（BEE）组成的“彩虹联盟”支持了南非向民主国家的过渡。（见图2“路径一”）“专制型利维坦”通过强化社会能力、制衡或削弱国家力量等手段最容易进入这条“走廊”。而“纸老虎利维坦”和那些像尼日利亚蒂夫族的国家和部落如想进入这条“走廊”，则必须同时强化国家和社会力量，可以说“道阻且长”（见图2“路径二”）。劳动力胁迫程度[1]、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走廊”宽窄的重要变量。面对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轮番而来的各种新挑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给他们心目中的“优等生”们提出了建议：国家必须强大并肩负起应对时代变化的新责任，社会必须时刻警醒和强化自身能力，如此国家方可不跌出这条“狭窄走廊”。

二、贡献与特点

该书的贡献之一是试图证明强国家和强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创造了达致自由繁荣的“狭窄走廊”，为关于国家、社会和自由三者关系的下一步研究提供了鼓励与指引。纵览全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搭建了以明晰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基础的动态模型，打破了西方长期将政治自由视为一种持久、稳定结构的幻想，强调“以动制变”的重要性；其演绎推理和规律验证水到渠成，历史实例丰富，叙事宏大，“狭窄走廊”“红皇后效应”等比喻形象生动；国家和社会竞合达到平衡，由此达致自由和繁荣的逻辑清楚明了，引人深思。

《狭窄走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超越了两位学者近年来竭力提倡的“制度决定论”中“民主最优”的论调。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多次指出，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并不必然行走在达致自由繁荣的“狭窄走廊”中。例如，印度和拉丁美洲的例子告诉我们，选举制民主国家不一定位于“走廊”之中，而被认为拥有相对自由和繁荣的许多中世纪欧洲国家也非民主国家；换言之，“民主体制与‘受束缚的利维坦’之间存在选择性亲和度（elective affinity）”，“进入走廊不意味着会一直自动待在里面”。[2]

作者其实在为自由主义民主敲响警钟：虽然英美两国率先进入了自由繁荣的

1 劳动力胁迫（labor coercion）的形式多样，书中列举的例子有奴隶制、土地重新分配、雇员胁迫等。

2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671; p. 688.

虽然英美两国率先进入了自由繁荣的“走廊”，这并不代表它们可以永远在此待下去，国家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平衡不会一成不变，为了维持两者的平衡也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走廊”，这并不代表它们可以永远在此待下去，国家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平衡不会一成不变，为了维持两者的平衡也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时常陷入不能达成妥协的僵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撕裂程度上升，民粹主义盛行，特朗普受到美国中年白人男性的追崇。参看今日，西方国家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后，一片狼藉且至今未恢复元气，如今再度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民主制度是否仍是一众西方学者眼中最优越的制度？结合现实，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提醒或许是促发民主最优论者重新思考的一处起点。

与此同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这本著作与自由主义学派及弱国家强社会论拥趸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为智识界提供了广阔的辩论空间。《狭窄走廊》指出，能够维持秩序并提供广泛公共产品的强大国家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却非其充分条件。当国家强大到足以拥有控制、甚至主宰社会的能力时，有可能与自由形成对立并阻碍繁荣的到来。自由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强大的社会互相平衡竞合，这是书中一个重要且被反复强调的观点。不少关注国家发展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乔尔·米格达尔（Joel Migdal）和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等。[1]

三、几点疑问

然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论述中也存在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首先，有评论指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强社会”的叙述出现了定义重复。他们将“强社会”定义为能够“竞争、约束和制约”国家的社会类型。[2] 但是，这个定义显然缺少一个独立衡量社会力量的标准，因为它是在用因变量（即束缚国家的能力）来评估自变量（社会的力量），如此便无法真实评估国家或社会变得更强或更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谢丽·伯曼（Sheri Berman）建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可以将社会力量密度和性质作为衡量标准，因为这对他们书中重点强调的社会参与和动员行为（包括公民是否能够进行合作、可否克服集体行动问题和参与政治行动等）具有关键性的影响。[3]

其次，对决定最优状态下国家—社会平衡为何出现的变量表述不甚清晰。作

1 Sheri Berman, “Critical Dialogu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8, No. 3, 2020, p. 903.

2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146.

3 Sheri Berman, “Critical Dialogue,” pp. 903-905.

者自称不仅描述了通往自由繁荣的条件并给出了案例分析，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明确的理论核心。[1] 既然理论通常回答“为什么”的问题，那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的理论核心则要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有时会进入（或掉出）这条达致自由繁荣的狭窄走廊”。诚然，《狭窄走廊》一书贡献了古今中外的各式案例，作者对各种文化、各段历史、各番书目引证信手拈来，但提供的讨论过于宏大多元，落到细节之处却并未能总结出明确、统一的结论。文中虽指出形成政治联盟、相对“走廊”位置和“走廊”的形状是国家能否进入“狭窄走廊”的关键要素，但对决定“受束缚的利维坦”类型的国家达到国家—社会平衡关系的变量讨论却模糊处理，略为遗憾。

再次，在强调国家和社会强弱重要性的同时，作者似乎忽略了关于国家和社会性质的探讨。举例来说，一个由反精英、反建制力量组成的强国家和性质相反的另一种强国家，虽同样都有能力为其公民提供广泛的公共产品，或者以暴力机关来维护社会秩序，但两者是否同样都能与一个能够束缚它们的社会相容，并与之相互促进、带来自由和经济繁荣？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和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如果只考虑其动员、参与政治能力的强弱，则两者虽看似旗鼓相当，但在面对国家膨胀的控制力时，是否有相同的动机对其施加约束？

此外，书中仍持明显的传统“欧洲中心论”立场，对中国的描述显得简单粗暴，无助于思考世界政治体制中的各种分歧。尽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承认民主制度与进入“狭窄走廊”之间存在选择性亲和度，但其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对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自信态度。并且，在阐述何为与国家能力对应的社会能力时，二人认为，社会能力主要体现在社会能够通过动员、组织、抗议等方式参与政治，而西方概念中的民主体制正是社会能够通过上述行为表达意愿的必要条件。书中将中国列入“专制型利维坦”类型的国家，相应的章节仅简单归纳了西方汉学的基本观点，不免让人产生对西学硬套于中国文化现实的质疑。再者，二人认为经济发展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权力强弱，也有脱离实际情况、鼓吹“西方例外论”的嫌疑。

最后，国家—社会平衡与“狭窄走廊”之间简单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国家演变与社会变迁中所含的偶然性是否也应纳入考虑？第三方因素是否助长了国家—社会权力的平衡与自由繁荣的“狭窄走廊”二者之间的伪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美、中、德等庞然大国与尼日利亚蒂夫族、意大利公社等小邦和部族是否具有可比性，比较得出的结果是否公平？ 皆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令人不安的不稳定阶段，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描绘的这条

1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 48.

“通往自由与繁荣的狭窄走廊”会否因此缩短、变得更窄？被作者认为难以进入这条“走廊”的“中国模式”，是否会证明自己在走向一条长期、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道路？民主的前路在何方？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为标志的技术进步，会给人类追寻自由和繁荣的进程带来更多正面支持，还是负面冲击？无论答案如何，如该书作者所言，国家与社会都应保持清醒，衡量现实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评估与调整，迎接层出不穷的新挑战，如此方能实现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个层面的自由。